

田野與數據裏的中國基督教

——神學論題引介

孫尚揚

主題策劃

本輯《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彙集了五篇主題論文，涉及的都是漢語語境中的基督教研究。如果我們採用廣義的漢語神學概念，即認為漢語神學就是在漢語語境中或以漢語表述的對基督教的研究，又採用黃劍波博士所倡導的廣義的田野概念，即認為人類學的「田野」不僅僅在一個村落、在一個地方、在一個人群，也在歷史之中，在文本之中，那麼，我們認為，以「田野與數據裏的中國基督教」來標示這五篇論文的共性或共同主題，或許不無道理。

這五篇論文中，黃劍波、劉琪、褚瀟白三位青年才俊採用的是人類學的研究路徑，〈北京市大學生基督徒的教會選擇與宗教委身〉一文則使用的是宗教社會學中定量研究方法，盧明玉博士的大作當然屬於史學範疇，但其視角頗受女權思想（或亦與社會理論有關）影響。儘管學術界對人類學究竟屬於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存有爭議，並且有學者做過細緻的分疏，但斷言這五篇論文皆受社會理論之浸染，應該大體不差。

因此，在闡述這五篇論文的主要貢獻之前，完全有必要談談社會理論與神學之間的關係。

深受啟蒙話語與世俗化理論影響的漢語學術界可能很容易接受以下觀點：社會理論與神學之間毫不相干，甚至互相衝突。因此，當著名社會學家貝格爾（Peter L. Berger）明確地宣稱社會學理論沒有與神學進行對話的內在必要時，他的論斷很容易在漢語社會學界產生共鳴。貝格爾還申論道：「認為社會學家只是提出了某些必須由神學對話伙伴在『對話』中來回答的問題，這種仍然流行於一些神學家之中的看法，必須以很簡單的方法論上的理由予以拒絕。」¹他所說的方法論上的理由指的是，社會學是一種經驗科學，它所提出的問題，是不能從非經驗和規範學科的意義框架出發來作出回答的。貝格爾深受經典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影響，他在社會理論與神學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可謂其來有自。

然而，學者們的研究表明，源自韋伯並在貝格爾那裏得到深入闡發的「無關說」，只是有關社會理論與神學關係問題上的一種觀點。哈林頓（Austin Harrington）在《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第四章「社會理論與神學」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較深入全面的類型學分析，他認為，在社會理論與神學的關係問題上，有五種立場，茲以右表示之。²

哈林頓在檢視以上五種立場的得失利弊之後，認定最後這種立場最具前景。因為它突顯了社會科學是如何既意識到自己在神學中有其思想根源，同時又能通過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自我克服等內在的努力，尋求並實現與這些根源

1. 貝格爾著，高師寧譯，《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理論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206。

2. 吉拉德·德朗蒂編，李康譯，《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64。

	「社會科學…」	代表人物	初步評價
1	「…是世俗化的神學」	洛維特 (Karl Löwith) 沃格林 (Eric Voegelin) 米爾班克 (John Milbank)	犯了生成錯誤 (genetic fallacy : X 源自 Y, 因此 X 等於 Y)
2	「…與神學毫無關係, 並且相互衝突」	韋伯	各價值體系之間 不可通約
3	「…與神學有辯證互動」	布洛赫 (Marc Bloch)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總體性問題: 難以 統合科學與超驗
4	「…將神學轉譯成世俗話語性的道德主張」	塗爾幹 (Émile Durkheim)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可能有理性主義 相對於信仰的帝國主義
5	「…具有神學起源, 但與之保持批判性距離並且沒有全盤忘卻神學」	特洛爾奇 (Ernst Troeltsch) 布魯門伯格 (Hans Blumenberg) 利科 (Paul Ricoeur) 圖尼埃森 (Michael Theunissen) 泰勒 (Charles Taylor) 約阿斯 (Hans Joas)	有待考察

之間保持距離與自主。³哈林頓的這種論斷恐怕很難被漢語學術界奉為圭臬，人們更多地可能還是尊奉韋伯等人的無關說，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社會理論應該追求研究的價值中立等原則。但無論如何，哈林頓的上述類型學分析至少

3. 同上，頁 64-65。

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告誡我們，在關於社會理論與神學的關係問題上，除了無關說以外，還有其他一些並非完全無理的立場。

就我本人多年的觀察而言，漢語神學不僅對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是開放的，對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也保持着開放的姿態。迄今為止，道風書社已經出版過四種從宗教社會學、人類學的視角出發對中國基督教進行實證研究的專著，⁴《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也出版過宗教社會學的專號，⁵發表了不少相關的研究論文。「田野與數據裏的基督教」之所以能被納為本期的論題，正是這種開放的結果。

但是，漢語神學更關注的可能是，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實證研究是否能對基督教（包括神學）保持足夠的開放性。對這種關注甚或疑問，可能的回答有以下兩種：（一）如果只是秉承一度非常流行的「研究宗教，批判神學」這一原則（筆者認為這一原則就像「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一樣不可能被永遠奉為圭臬），那麼，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實證研究對基督教（尤其是神學）將保持着武斷、簡單的批判性的開放性，不願與之發生其他關聯，甚至連馬克思等人曾經從猶太—基督教傳統中吸取、改裝了一些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元素這樣的事實⁶也會予以斷然的拒斥。若然，則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實證研究將喪失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二）如果相信學術的多元化不會損害思想與文化的進化，或者，套

4. 吳昊，《麥芒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吳梓明等，《聖山腳下的十字架——宗教與社會互動個案研究》（2005）；高師寧，《當代北京的基督教與基督徒——宗教社會學個案研究》（2006）；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2012）。

5.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6（2007），主題「宗教社會學研究」，主題策劃高師寧、楊風崗。

6. 吉拉德·德朗蒂編，李康譯，《當代歐洲社會理論指南》，頁62。

用中國大陸曾流行甚久的意識形態話語，即如果相信並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勝過萬馬齊喑這一觀念，那麼，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實證研究對基督教尤其是神學或許會採取超越單一的「無關說」、「衝突論」的多種立場。相信這種立場的多元化無論是對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對基督教的實證研究，還是對漢語神學本身的建構，大而言之，對整個漢語學術文化的建設，都是利大於弊的。

以下，筆者將以漢語語境中的社會理論與相關的對基督教的實證研究與漢語神學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為主線，檢視一下本期《道風》中的五篇主題論文。

黃劍波博士的大作〈人類學與中國基督教研究〉首先較全面地概述了海內外人類學對中國宗教研究的現狀、特點及其得失，他注意到，這種研究中鮮有對於作為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人們誤以為宗教人類學就是對「部落宗教」的研究——這是對宗教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或範圍的誤解，並且誤以為宗教人類學就是關於宗教現狀的實地調查研究——這是對宗教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的誤解。這兩個錯誤的印象又與人類學本身的「身世」有關：它在傳統上確實不甚關注基督教，甚至刻意規避對基督教的研究。在切身且豐富的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根據對國際宗教人類學的前沿動態的了解，黃博士針對第一種誤解提出：超越區域—族群性宗教研究的人類學取向，轉而對基督教這樣的世界性宗教進行人類學研究，不僅是需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針對第二種誤解，黃博士提出了本文開篇已經提及的更為寬泛的田野概念，進而強調，人類學的研究絕不僅僅是關注「現狀」，也注重研究歷史脈絡或場景中的「當下」。針對宗教人類學注

重儀式、實踐研究的偏好，為了補偏救弊，他還為人類學對中國基督教的研究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即要同時關注中國基督教的三個維度：被傳講的基督教、被認知的基督教和被實踐的基督教。當然，這並不妨礙黃博士本人在自己的研究中雖然關注前兩個維度，卻更注重在中國基督徒生活中被實踐的基督信仰。在黃博士的具體建議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關注不同地方和人群的基督教的想象的共同體意識，還有跨國和跨區域的網絡問題。與此相關的是另一種研究進路，即強調基督教作為一種「外來者」對個人和地方社會與文化所造成的斷裂或非連續性。在筆者看來，這種研究進路尤其適合漢語語境中基督教研究，而與之相關的是歸信與張力等一系列的社會學問題。

在討論與結論部分，黃博士概述了他擬議並且親力實踐過的全球地方化視角下的基督教研究⁷既是一種宗教研究，也是一種人類學研究，更是一種中國研究，因而可以在以上三重意義上與更大層面的宏觀研究進行對話。而其旨趣則是本着一種「世界人類學」的構想，一方面超越地方性的取向，試圖將人類學帶入更為廣闊的世界領域，甚至處理「世界史」的議題，另一方面又回到地方，在地方思考普遍性的問題，為世界提供一種「地方的世界觀」。這種立基於社會理論的高屋建瓴的學術理想適足為漢語語境中的基督教研究即廣義的漢語神學之建構提供一種可資借鑒的藍圖。其對漢語神學的開放性表明，社會理論與漢語神學完全可以建構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相信這種廣義

7. 黃劍波著有《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吳莊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2）和《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

的漢語神學的發展會為社會理論的豐富乃至某種突進提供資源。

劉琪博士在其〈基督教與個體主義關係之再思——基於一個個案的探討〉一文中，以其觀察到的被實踐出來的中國基督教個案為例，說明在西方與新教形影相隨的個體主義信仰模式，在她所進入的田野（一家北京市的民工教會）中是付之闕如的。實際情況是，這家教會中沒有形成在西方信仰模式中司空見慣的個體主義價值體系，個體與上帝之間的人神關係並非其信仰的中軸，這些民工信徒的信仰是以一種集體性的方式，圍繞着教會這個群體建立起來的。具體就歸信而言，是地緣與親緣等社會與自然因素（而非個體性的生命事件）將他們帶入信仰之中，形成一個具有靈性紐帶的群體。而就信仰生活而言，不是個體化且內在化的禱告、靈修等宗教生活方式，而是聚會之類的集體活動，才是維持這些民工信徒之信仰的關鍵因素。而「神蹟」和「苦難」則是這些民工在聚會中常常談及的兩大主題，前者以實用主義的方式滿足了他們生活中的實際需要，而對苦難的解釋與化解則為他們提供了內心的力量。而對這兩個主題的神學釋義也是在教會聚會中獲得的，而非個體性冥思與宗教經驗之產物。此外，劉琪還注意到，探尋這些農民工信徒的信仰是否純正或者正統是徒勞無益的，因為基督教本身就具有多樣性，而對這些信徒來說，重要的不是他們對信條的理解是否清楚、完整、準確，而是能否按照教會的要求完成儀式實踐。換言之，他們一如既往地傳承了中國農民信徒注重正統實踐，輕忽正統信仰的傳統宗教性。劉文着重強調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觀察、發掘農民工信徒的信仰之質素與樣態，亦即重視被農民工信徒實踐出來的信仰。如果她從宗教社會學中意義

理論這一視角出發，分析一下這些農民工信徒對「苦難」的釋義，相信可展示社會理論在提高廣義的漢語神學水平方面的積極作用。

〈北京市大學生基督徒的教會選擇與宗教委身〉一文採用來自「北京市大學生對基督教的態度調查」這一項目所獲得的數據，對北京市大學生基督徒為何選擇信仰基督教、如何選擇教會及其宗教委身呈現何種態勢等問題做了定量分析與回答，這是本期《道風》中唯一的一篇以定量分析為主的論文。這篇論文選擇的社會理論框架是目前在宗教社會學界頗為流行也頗受爭議的理性選擇論，選擇這種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種理論不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對糾正長期以來將宗教視為迷信、非理性的病症等偏見具有針對性與適切性。全文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北京市大學生選擇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社會網絡的影響使然（這與劉琪通過對農民工基督徒的田野調查與定性分析得出的結論高度相似），而皈依後選擇家庭教會的大學生基督徒是選擇三自教會的將近兩倍，他們在家庭教會與三自教會之間作出的選擇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態勢，則主要歸因於家庭教會提供的理念（或意義系統）與歸屬感更具吸引力，其活動場所更具可及性。這些發現驗證了理性選擇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斯達克（Rodney Stark）、芬克（Roger Finke）關於改教的一些論述。該項研究還發現，北京市大學生基督徒對張力較高的教會的委身程度相對略高，這也證實了理性選擇論關於宗教委身的論述。但是參與未登記家庭教會的大學生信徒對該教會委身的不穩定性則表明，理性選擇論關於宗教委身的論述並不能全盤照搬挪用到尚未充分自由化的宗教市場中，因為它未考慮到中國社會中的「合法性」這一事關

宗教管制的重大問題。對當代中國基督教中的局部現象的描述與解釋帶來的是對社會理論的部分結論的驗證與對部分結論的證偽，不知社會理論能否從中受益？需要說明的是，這篇論文的兩位作者均非任何宗教之信徒，亦無意充當任何宗教之軍師，但其實證研究客觀上是否能對當代漢語神學的發展提供某些啟示？以上兩個問題尚待學界、教界給予關注與解答。

褚瀟白博士的大作〈一個異在化符號的民間演繹——對《謹遵聖諭辟邪全圖》的符號人類學研究〉將研究對象錨定在一種特殊的文本之上，此即晚清反教漫畫《謹遵聖諭辟邪全圖》。此種歷史研究與文本分析如無深厚的社會理論功力之支撐，常常會流於繁瑣之考證與表像的史實勾勒與敘述。而褚文則採用符號人類學的相關理論，對上述獨特的反教文獻做了精深獨到的分析。

眾所周知，羸弱不堪的晚清政府之權力受制於西方列強，對其既懼且恨的「洋教」——基督教由於不平等條約而基本處於失語狀態，而民間（主要是鄉紳）的反教話語——褚文將其界定為亞政府或超政府的話語方式——卻成為已然失語的政府之重要補充。褚文注意到，這種話語訴諸民俗的象徵符號世界，並且其敘事完全依賴於象徵（而不是支撐象徵的理性形式）；它將複雜的世界簡單地歸類為二元對立的符號結構：人的符號和獸的符號，於是將耶穌基督刻畫成一種完全異在化的無恥貪婪、淫逸矯奢的公豬或豬精形象，洋教徒為羊精或小豬精，而中國信徒有時候呈現人形，有時候呈現清一色獸形。鄉紳們的反教漫畫這種形象文本的二元性是內在於符號的二元性的，此即以華夷二元對立範疇將他者動物化、妖魔化，並進而將這種二元對立擴展為非基督徒與基督徒亦即善與惡的二元對立。

褚文還注意到，像崔棟和周漢這樣的反教者的鄉紳身份在鄉土中國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他們不僅承擔着融彙大小傳統、行使教化和保護鄉民的功能角色，還是官府與民間的溝通中介，外來宗教的闖入對他們的權力資本與文化資本都具有侵蝕性影響。耶穌基督的符號植入鄉村的生活方式，必定帶來鄉紳們所支配之符號世界的顛覆。因此，褚文斷定，在以崔棟和周漢為代表的反教運動中，醜化甚至妖魔化耶穌基督形象的符號化運動，其實是這種身份之爭，是話語權力之守持與顛覆之爭。褚文此論的基礎是：在相對封閉的生活世界中，兩種對立的符號是不可能共存的。褚氏此論是否具有普遍性？這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明末第一代天主教徒如王徵、韓霖就曾在相對封閉的生活世界中，將孔子與耶穌這兩個在清末反教者看來完全不相容的符號熔冶於鄉約等由鄉紳擔綱主角的社會建制之中，而且在理論和實踐上均無大的滯礙。⁸看來權力資本與文化資本還是可以通過一定的轉移方式得到保存的，斷裂只會發生在那些以二元對立的符號與生活方式處理這些問題的人士身上。

褚文還對反教鄉紳的二元符號結構中的疆界路標（「孝」與「貞」，實際涉及的是儒教倫理中的孝道與男女大防等具體規範）與基督教人神關係景觀中的相應的倫理規範之間的對峙，還有那些強化反教鄉紳的二元符號結構的外在因素都做了深入的符號人類學考察和分析，多有精彩之論，這裏不復贅述。褚文的結論是，《謹遵聖諭辟邪全圖》中以「豬精」耶穌為核心的異在化符號體系使我們看到文化觀念背後的生存方式之爭，也彰顯了一種流動

8. 參孫尚揚，〈王徵聖愛觀中的儒耶融合〉，載《道風》19（2003）；孫尚揚、肖清和，〈導言〉，載《鐸書校注》（北京：華夏，2008）。

於社群日常生活中的本土性意識。多重性的權力與話語之爭是清末鄉紳反教運動的真正底蘊。

儘管褚文並未對其用作分析基礎的符號人類學做掉書袋式的理論鋪陳，但這種將理論積累不露斧鑿之痕地運用於對中國基督教文本的分析之做法，與那些食洋不化的照搬照套的高頭講章相比，可謂高下立判。褚文表明，同樣的關於中國基督教的文本，若有適當的社會理論之照耀，就會放射出引人注目的思想之光。儘管我們不能說褚博士對清末反教鄉紳抱持的是同情理解的態度，但她對這些鄉紳設身處地的換位思考，令其得出的結論顯得在平實公允中見深度，可謂不偏不倚，不激不隨。作者對自己的認信與偏好的隱忍，亦可謂卓爾不群。

盧明玉博士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華人、西士以釋放女子為題所作的借題發揮〉對清末西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與華人任廷旭合作編譯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1903年印行）這一尚未引起普遍關注的中國基督教文獻中所包含的現代觀念與思想，做了初步梳理與分析。這本是一部主旨在於引介婦女解放思想的編譯之作，但編譯者卻做了大量的借題發揮，涉及的論題可謂五花八門，但對這些論題的闡發在當時的中國語境中卻可謂切中肯綮，極具針對性，因而頗具建設性。該書對基督教與儒教、西學與中學、專制與民主等重大論題對做了比較分析，其中隱含的按照基督教社會理想改變或改造中國的意圖可謂彰明較著。當然，其主旨仍然是宣講婦女解放，傳揚衡量國家文明教化的標準是婦女被釋放的程度，中國要富強，就必需通過皈依基督教提升婦女地位、振興女學。相信這些新異的現代思想在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的中國社會轉型期，所起到的作用不小，在思想界亦具有振聳發

贖的解放意義。僅從廣學會統計的暢銷書中，該書高居第二這一事實，即可見其影響之一斑。

從以上五篇主題論文來看，不論是對田野（包括歷史文本）中的中國基督教，還是對數據中的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如果能自覺地引入某種社會理論，都會有所斬獲。對廣義的漢語神學而言，社會理論的引入不僅會拓展其視野，深化其理論深度，而且會強化其現實針對性。而對中國基督教豐富多樣的實證研究，也會反哺西方社會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甚或修改與發展相應的社會理論。當然，拘泥於哈林頓的那種關於神學與社會理論的立場的類型學分析，做一一對應的歸類入檔，在此似乎是意義不大的。重要的是自覺引入社會理論，形成漢語神學與社會理論之間的良性互動。

關鍵詞：田野 數據 社會理論 漢語神學

作者電郵地址：sunsy1965@gmail.com

Chinese Christianity from the Field and Data: An Introduction

SUN Shangyang

Ph.D., Pek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introduction provides a broad definition of field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After introducing and commenting on five posi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heory and theology generalized in Austin Harrington'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and following the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theory and Sino-Christian theology, this introduction reviews five thematic articles included in this issue of *Logos & Pneuma*.

Keywords: Field; Data; Social Theory;
Sino-Christian Theology